

唐五代诗格丛考

张 伯 伟

清人沈涛《匏庐诗话·自序》指出：“诗话之作起于有宋，唐以前则曰品，曰式，曰格，曰范，曰评，初不以诗话名也。”品、式、格、范、评，其实都可以用“格”来代替。唐五代的诗格，除了郭绍虞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（大学丛书本）及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曾经有所介绍以外，研究论述之作向不多见。近来，笔者在对唐五代诗格的辑校过程中，就其中的一些文献问题略有所考。兹稍加整理，谨述于下。

一、《文笔式》 佚名撰

《文笔式》，作者不详。此书在中国历代书目中未见著录，中土也没有流传。藤原佐世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“小学家”类录有“《文笔式》二卷”，其遗文散见于日僧空海所编之《文镜秘府论》中。

关于此书的产生年代，中外学者有不同的意见。罗根泽《文笔式甄微》（载《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》第三卷第三期，1935年1月）根据此书所引及的诗无唐人作品，以及称温子升、邢邵、魏收诸人为“近代词人”等线索，推断作者为隋代时人。王利器《文镜秘府论校注》复根据书中引徐陵文有“诚臣”一词，认为当出于作者避隋高祖杨坚之父杨忠讳而改，遂谓“此书盖出隋人之手。”日本小西甚一《文镜秘府论考》“研究篇”则根据

此书与上官仪《笔札华梁》（其遗文亦见于《文镜秘府论》）在内容上的近似推论，假如是前者引用了后者，则其作者当与上官仪同时或稍后；反之，则《文笔式》在《笔札华梁》前。没有确证可说明其为隋时人，但可以断言其为盛唐前的作品。

今案：使用“诚臣”一词未必可证其一定出于隋人之手。如唐太宗《赐萧瑀》诗亦有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诚臣”（《全唐诗》卷一）之句，根据《旧唐书·萧瑀传》载，此诗乃作于唐贞观年间，即为一明证。今本《文笔式》引及鲍照《河清颂序》（见《文镜秘府论》西卷《文笔十病得失》），据兴膳宏校注之《文镜秘府论》，鲍照的“照”各本均作“昭”，乃避武后“曌”之讳而改。又《文镜秘府论》东卷《七种言句例》自一言句至七言句全录《笔札华梁》，八言至十一言则录《文笔式》，显然后者是出于对前者的增补。又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大致按作者先后分类排列，《文笔式》乃在杜正伦《文笔要诀》之下、元兢《诗髓脑》之前。据《旧唐书·杜正伦传》，杜氏卒于唐高宗显庆三年（658）以后。综上所述，我认为《文笔式》的产生年代当在稍后于《笔札华梁》的武后时期。

考今本《文笔式》的内容，出于其自创者并不多见，许多地方雷同于刘善经的《四声指归》及上官仪的《笔札华梁》，所以在辑佚的过程中，往往不易作十分确切的釐清。但三家所说既然宗旨一贯，后出者便不妨既引述袭用，又有所增补附益，这也是古书中的一条通例（参看余嘉锡《古书通例·辨附益》）。

《文笔式》一书在中土虽未见流传，但托名魏文帝的《诗格》，其中一部分内容就是袭自《文笔式》。而此书由于较早传入日本，于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如平安时代空海的《文镜秘府论》中曾大量引用其文；藤原明衡所编之《本朝文粹》，在卷七《省试诗论》中也记载了当时文人以《文笔式》的理论作为讨论诗歌声病的依据之一；镰仓时代释了尊的《悉昙轮略图抄》（见《大

正新修大藏经》第八十四卷）中也曾经加以引用。可见这本书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。

二、《诗格》 佚名撰

此篇遗文仅见于敦煌残卷中，编号斯3011。比较完整的三行是“七对”的名目，即的名、隔句、双拟、联绵、互成、异类，赋体。此外有“诗格一部。山青白雨多，山阵……去花落，不……”数字。此断片虽为残文，但有两点值得注意：其一，此七对的名目、顺序与《文镜秘府论》东卷《二十九种对》的前七对完全一致，可证其为时人之通说，也可为空海“古人同出斯对”之语作一旁证；其二，残卷从字迹上来看，幼稚拙劣，显然出于童蒙习书。而习书以诗格为内容，这从一个侧面透露了唐代诗格一类书在民间颇为流行的消息。

关于此书的产生年代，从内容上推断，应该是初盛唐之间的作品。从书写款式上来看，其中有将纸倒转倒书的现象。在敦煌写卷中，这种倒书现象往往出现于中唐以前，至中唐便少见，唐末张议潮后便绝迹（参看姜亮夫《敦煌碎金·导言》“款式问题”）。这也有助于判断此书的抄写年代大约在中唐以前。

三、《诗髓脑》 元兢撰

此书中国历代书目中未见著录，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“小学家”类著录有“《诗髓脑》一卷”及“《注诗髓脑》一卷”。

“髓脑”一词本为佛典用语。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》卷六：“能探一切头目、髓脑、身肉、手足。”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二十三：“观于内身、皮肤、肌肉、筋骨、髓脑，如空中云。”

《佛说佛名经》卷六：“头目髓脑，如弃涕唾。”“髓脑”是人体最为重要的部分，可引申为关键、要旨等义。六朝的著作已经开始使用“髓脑”一名，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“五行类”有

“《周易髓脑》二卷”，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则著录为《易髓》、《易脑》各一卷。《诗髓脑》一书的书名亦有取于此，其意指作诗的秘诀或关键。遗文见录于《文镜秘府论》中。《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》著录元氏《沈约诗格》一卷。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作《宋约诗格》，误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题作《诗格》，据中泽希男《唐元兢著作考》（载《东洋文化》复刊第十一号，1965年9月），此书实为《诗髓脑》的别名。

《诗髓脑》的内容，目前可考的是“调声”、“对属”及“文病”三部分，反映了古诗向律诗过渡阶段的理论总结。“调声”是律诗的基本条件，其中亦引元氏自己的诗为例；“对属”则显然比上官仪之说要宽泛一些；“声病”则在沈约“八病”的基础上，又提出新的“八病”，其重点不在声律，而在字义。

《诗髓脑》在唐代已传入日本。《半江暇笔》谓此书由空海携归，并将其文辑入《文镜秘府论》中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在东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如《本朝文粹》卷七《省试诗论》记载当时文人每引《诗髓脑》为立论依据；《作文大体》的前半部分是大江朝纲（886——958）所撰，其论“诗病”、“字对”、“调声”等，多受《诗髓脑》的影响。如论“平头”之“第一字用平声不为病也”，“上尾”之“发句连韵不为病”，“蜂腰”之“平声不为病”等，显然是出于对《诗髓脑》的因袭。而日本的歌论著作，也往往以“髓脑”命名。如藤原公任的《新撰髓脑》、源俊赖的《俊赖髓脑》等，而《八云御抄》卷一“正义”也将《新撰髓脑》、《能因歌枕》、《俊赖无名抄》、《绮语抄》、《奥义抄》统称“五家髓脑”。《基俊和歌口传抄》卷上有“家家髓脑”之说；《悦目抄》亦云：“上古歌仙，髓脑口传。”可见元氏《诗髓脑》影响之一斑。

四、《诗式》 佚名撰

《文镜秘府论》西卷《文二十八种病》第十一“阙偶病”及第二十一“支离病”至第二十五“文赘病”等六病，据三宝院本的记载，乃出自《诗式》“六犯”条。小西甚一《文镜秘府论考》“考文篇”认为此书“撰者不明”。尽管皎然著有《诗式》五卷，但空海引皎然语均出于《诗议》，而不及《诗式》，相信“六犯”不出于皎然。从“六犯”的内容来看，如“相滥”、“文赘”病下，《文镜秘府论》复引崔融说，尤其是“文赘”病下注“或名涉俗病”，“涉俗”正为崔融命名；又旧题王昌龄《诗中密旨》“犯格八病”节，也全袭用此《诗式》之“六犯”及崔融《唐朝新定诗格》之“六犯”节。以此推论，本书作者当与崔融同时或稍前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八著录唐代僧辞远《诗式》十卷，不知是否即为此书。

五、《唐朝新定诗格》 崔融撰

此书中国历代书目未见著录，惟《日本国见在书目》“小学家”类著录有“《唐朝新定诗格》一卷”，不题撰者。《文镜秘府论》东卷《二十九种对》提及“崔氏《唐朝新定诗格》”。又地卷《十体》引作“崔氏《新定诗体》”，可知“诗格”、“诗体”即为一书。日人《半江暇笔》云：“我大同中，释空海游学于唐，获崔融《新唐诗格》等书而归，后著作《文镜秘府论》六卷。”可知《文镜秘府论》所引“崔氏”云云即出自崔融《唐朝新定诗格》。

崔融与李峤、苏味道、杜审言为“文章四友”，诗文以“华婉”著称，朝廷大手笔多由其草拟。曾编《珠英学士集》，专选初唐朝士之诗，今存唐写本残卷二卷。王梦鸥认为《唐朝新定诗格》之撰与《珠英学士集》之编有关：“一则可为入选之诗张目；

一则可以搪塞落选者之口，其有此书，信非徒作。”（《初唐诗学著述考》）但据可以查明的诗例来看，书中入选的诗例大多为六朝作品，唐人之作仅崔明信、褚亮、上官仪三首而已，皆不及武后之世。据《唐会要》卷六十三载，《三教珠英》乃编成于武后大足元年，《珠英学士集》之编则更在此后。由此可知，《唐朝新定诗格》与《珠英学士集》未必有什么内在联系。

据《文镜秘府论》所引《唐朝新定诗格》的内容，计有“十体”、“九对”、“文病”、“调声”诸节，除“调声”直承沈约之说以外，其余均为唐人议论，与元兢《诗髓脑》颇为接近。所谓《唐朝新定诗格》，大概也是相对于齐、梁时代而言的。此书虽然不见于中国历代书目著录，但后人伪托李峤之《评诗格》，实即剪取崔氏书而成。又旧题白居易之《文苑诗格》，其“依带境”、“精华章”、“影带宗旨”、“雕藻文字”、“联环文藻”诸节，也受到崔氏书中“十体”节的影响。

六、《金针诗格》 旧题白居易撰

此书又名《金针集》。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为三卷；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则录作一卷。可知自北宋以来，就有两种版本流行于世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之一卷本当据《吟窗杂录》，与三卷本不同。如《郡斋读书志》云：“居易自谓与刘禹锡、元稹皆以诗擅命当世，撮诗之体要为一格，以病得针而愈，诗亦犹是也，故曰《金针集》。”此乃櫟括《金针诗格序》语，但《吟窗杂录》本的《序》中就无此一段，可见两种版本是不同的。至明代，黄省曾《名家诗法》卷一、朱绂《名家诗法汇编》卷五及胡文焕《诗法统宗》均收录《金针诗格》，但显然是经过了重新编排，其来源包括三卷本之残文、一卷本及旧题梅尧臣的《续金针诗格》。关于《金针诗格》与《续金针诗格》，陈振孙认为“大抵皆假托也”。

唐人诗格，既有为初学为诗而作者，也有为科场应举而作者。久而久之，“诗格”也就成为考试标准的依据之一，即所谓“依《诗格》、《赋枢》考试进士”（《册府元龟》卷六百四十）。赵璘《因话录》卷三云：“李相国程，王仆射起，白少傅居易兄弟，张舍人仲素，为场中词赋之最，言程式者，宗此五人。”据史志著录，除李程外，其余四人均有诗格类著作，如王起《大中新行诗格》、白居易《金针诗格》、白行简《赋要》、张仲素《赋枢》等。徐衍《风骚要式》引白居易诗云：“鸳鸯绣了从教看，莫把金针度于人。”则《金针诗格》实即授人以金针之谓。从当时科举考试以《诗格》为依据，而应举士子又以白居易等人为典范来看，白氏曾著有《金针诗格》一书恐亦不能断然否定。即使此书不出于白氏之手，但从《二南密旨》、《风骚要式》等书中对《金针诗格》理论的沿袭来看，其成书年代不会在晚唐以后。只是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有散佚，又经过后人的重编，所以现存的书里混杂了一些其它的材料，如“诗有八病”和“诗有六对”，乃出于沈约与上官仪；“诗有数格”则出于郑谷等人的《新定诗格》，当是杂凑的痕迹。

《金针诗格》对后来影响颇大，如其中“诗有内外意”、“诗有物象比”之说，在旧题贾岛的《二南密旨》中也得到发挥；关于“诗有四炼”的意见，也得到范温《诗眼》的肯定——“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”。再如“诗有义例七”，对于宋代的“白战体”也有理论先导作用。至北宋而有人为此书作续编，即旧题梅尧臣的《续金针诗格》。原作仅有纲目，续作则为之增补例句，并加以注释。

七、《文苑诗格》 旧题白居易撰

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二著录此书，并谓其作者“称白氏，尤非也”，已斥其为伪作。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以其

中“精颐以事”条中言及“古文用事伤浮艳，不用事又不精华”云云，推论“其伪作年代，在欧阳修等提倡古文以后也。”但古人有“文”、“笔”之分，“文”为有韵者，包括诗歌，此处的“古文”实即“古诗”。所以上条乃举陆机诗（原文作“古诗”）为例说明“用古事似今事，为上格也”。可见，虽然此书中有“古文”一词，却未必能够证明其产生年代在宋代古文运动以后。

此书引用六朝及唐人诗句为例，往往用“古诗”与“今诗”代其原题。但书中引及崔珣、戴叔伦、刘长卿、皎然的作品，亦称为“古诗”，而他们的时代多与白居易相接；孟郊的时代略后于以上诸人，引文又称作“今诗”；尤为不可思议者，乃引王昌龄的作品亦称“今诗”，而王昌龄的时代显然比戴叔伦等人为早。可知此书决非出于白氏之手，或为晚唐五代人伪托。如其颇重视意境，强调“语穷意远”；又注重讽谏，强调“裨益《国风》”。这些意见，都与晚唐五代人比较接近。

八、《二南密旨》 旧题贾岛撰

二 此书《崇文总目》文史类、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四及《通志·艺文略》八并著录为“贾岛《诗格》一卷”；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八作“贾岛《诗格密旨》一卷”；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二作“《二南密旨》一卷”，盖同书异名。陈振孙疑此书“恐亦依托”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七谓此书“议论乖谬，词意拙俚，殆不可以名状。……其论总例物象一门，尤一字不通。岛为唐代名人，何至于此？”陈振孙谓此书“凡十五门”，《四库提要》又谓今本乃于“十五门外，增立四十七门”，罗根泽则谓四十七门之外，实只五门，故怀疑“一十”乃衍文或后人所加（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）。

案：此书实即一十五门，今本与陈振孙所见者无异。所谓

“四十七门”云云，乃专指“总例物象”一节而言，其中已有脱落，仅存二十九门，所以《诗学指南》本有“今止二十九则”之注。贾岛的诗，思深意远，清奇僻苦，在身后影响甚大。杨慎《升庵诗话》卷十一“晚唐两诗派”条云：“一派学贾岛，则李洞、姚合、方干、喻鳅、周贺、九僧其人也。”李洞曾集其诗五十联为《贾岛诗句图》一卷。而就其诗的渊源来看，与大历诗人关系甚密。《二南密旨》的出现，当与此有关。据载贾岛“不善程式”（《唐摭言》卷十二），可知此书决非为应举者而作。从其引用的诗例来看，唐诗中有卢纶、钱起、皎然、皇甫冉、李嘉祐等人的作品，均为大历诗人。于此可知，《二南密旨》乃贾岛诗风流行的产物，大抵是为初学者而作，所以即使出于伪托，与贾岛的诗学依然是相通的。此书对虚中的《流类手鉴》颇有影响，许学夷《诗源辩体》卷三十五已指出“虚中仿于《二南密旨》”。如论南北二宗，谓“南宗一句含理，北宗二句显意”等，虚中亦有类似语；又如“论总例物象”一门，虚中称“物象流类”，并且在“举诗类例”节中多引贾岛的诗。略窥二者的联系，亦可从中推断此书的产生时间当在贾岛身后不久。

九、《炙轂子诗格》 王叡撰

此书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四、《崇文总目》“文史类”、《中兴馆阁书目》“文史类”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二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八及《通志·艺文略》八均有著录。《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》“别集类”录作“《诗格》一卷”，实为一书。

王叡，或作睿，自号炙轂子，生卒年不详。王梦鸥《炙轂子及其诗格考》根据《北梦琐言》的记载，定其为蜀中新繁县（今四川彭县东南）人。又杜光庭《神仙感遇传》亦载：“进士王叡，渔猎经史之士也。孜孜矻矻，穷古人之所未穷，得先儒之所未得，著《炙轂子》三十卷。六经得失，子史差谬，未有不针其

膏而药其育矣。……年八十，殁于彭山道中。”（《云笈七签》卷一百十二）据此可以推知，王叔当活动于唐宣宗至僖宗的时代。

《炙毂子诗格》引及李郢诗，据《唐才子传》卷八载，郢为唐宣宗大中十年（八五六年）进士，可知此书当成于其后。

此书首论章句所起，述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言诗之起源，颇类《笔札华梁》及《文笔式》的“句例”。继论诗之体裁，先标名目，后举诗例。其中偶有疏误，如“三五七言体”引高迈诗，实为李白之作。王梦鸥以“高迈”为“高适”之讹，亦为误断。《中兴馆阁书目》谓此书“叙诗体式所始，评其述作之要”，大致概括了此书的内容。

十、《风骚旨格》 齐己撰

此书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二题作“《风骚指格》”，卢文弨校本“指”作“旨”；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八录作“《诗格》一卷”，乃同书异名。又有《玄机分明要览》一卷，已佚。

《风骚旨格》标举格法甚多。薛雪《一瓢诗话》指出：“唐释齐己作《风骚旨格》，‘六诗’、‘六义’、‘十体’、‘十势’、‘二十式’、‘四十门’、‘六断’、‘三格’，皆系以诗，不减司空表圣。”其中“六诗”、“六义”为传统命题，但在表述上，不以叙述性文字下定义，而纯举诗例以明之，则当出于郑谷《国风正诀》之“分六门，摭诗联注”的格式，遂形成后来诗格写作的习惯之一。“四十门”论作诗题材，其余论作诗方法，均为齐己之新说，对以后诗格影响颇大。

此书的“势”论最引人注目。《蔡宽夫诗话》云：“唐末五代，僧流以诗自名者，多好妄立格法，取前人诗句为例，议论锋出，甚有‘狮子跳掷’、‘毒龙顾尾’等势，览之使人拊掌不已”

（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十引），就是指的《风骚旨格》。神珙《诗格》亦有“十势”，其中五势出于齐己；徐寅《雅道机

要》列“八势”，亦因袭齐己；佚名的《诗评》中“诗有四势”节，也是从齐己“十势”中稍加变化而来。可见其势论在晚唐五代诗格中是颇具代表性的。齐己“势”论的来源，与禅宗影响直接有关。他出于沩仰宗，而“仰山门风”的最大特点即在于“有若干势以示学人”（《宋高僧传》卷十二），“分列诸势，游戏无碍”（杨亿《汾阳无德禅师语录序》）。所以，齐己的以“势”论诗，正有得于仰山的以“势”接人。如“狮子返掷势”，就出于禅宗话头。禅宗有“狮子频呻”、“狮子返掷”、“狮子踞地”三句（见《五灯会元》卷十四《大阳景玄禅师》）。“狮子返掷”正属于禅宗三关之第二关境界，地水火风，色声相味，尽为本分，皆是菩提，故齐己举“离情遍芳草，无处不萋萋”以明之。可见此类势名颇难索解。《一瓢诗话》谓“‘十势’立名最恶，宛然少林棍谱”，似亦未能探得其源。

《风骚旨格》在诗格类著作中影响甚大，许学夷《诗源辩体》卷三十五云“文（此字应作‘神’）或‘十势’又仿于齐己”，又云“徐寅多出齐己”，可略窥一斑。

十一、《诗中旨格》 王玄撰

此书可分前后两部分。前半为诗格，开篇即云：“诗者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时明则咏，时暗则刺之。今具诗格于后。”其所谓诗格，实为示人以美刺的方法。后半部分标为“拟皎然十九字体”，乃就皎然《诗式》提出之高、逸、贞、忠等十九字加以解释，并附以诗例。此后半部分曾经别出单行，故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二著录有《拟皎然十九字》一卷。

此书征引诸家之诗，但题名多有误字、漏字。罗根泽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称此书“所引诗人，若贾休、莫休、僧扈、僧可、李昌遇、处纶、陈况、韩喜、西蟾、李鄂、何景山、番复（谓）之类，一时别无可考。”又谓“刘昭见《宋诗纪事补》卷七十

六，元昉见《宋诗纪事》卷九十三，但都无年代行历。”今细考原诗，可知“贾休”、“莫休”乃“贯休”之误；“处纶”乃“处默”之误；“何景山”乃“朱庆余”之误；“番谓”乃“潘纬”之误；“僧可”乃“僧无可”之略称；“西蟾”即“栖蟾”。而“刘昭”实为“刘昭禹”，乃五代时人。至于元昉，检诸唐宋史乘，大致有三人：其一为日本沙门，唐玄宗开元四年（七一六年）入中国求法（见《佛祖统纪》卷四十）；其二为四明僧，号雪汀，《宋诗纪事》卷九十三录其诗一首，但年代不详；其三为北宋初汉州什邡（今四川什邡）竹林寺僧，祖印居讷禅师十一岁时，曾依僧元昉出家（见《续传灯录》卷六）。据《佛祖历代通载》卷十九记载，祖印禅师卒于宋神宗熙宁四年（一〇一七年），世寿六十二，则其十一岁依僧元昉时乃真宗天禧五年（一〇二一年），如果元昉当时的年龄是六、七十岁，则其生年当在五代末。倘若他就是《诗中旨格》中所引及的元昉的话，可以推知，此书的产生年代已在北宋之初了。

十二、《诗格》 神或撰

此书今传诸本并题作“僧文或撰”，误。文或，号文宝大师，五代时闽僧，与陈文亮同时。史志均未著录其有《诗格》之作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二及《宋史·艺文志》八并题作僧神或撰。陈振孙于《杂句图》下云：“自魏文帝《诗格》而下二十七家已见《吟窗杂录》。”陈氏著录的顺序与今本《吟窗杂录》大致相同，此《诗格》一卷正在《风骚旨格》和《处囊诀》之间，可知陈振孙见到的旧题北宋蔡传所编之《吟窗杂录》，此书正作“沙门神或撰”。今本作“沙门文或撰”，当为后人不知神或其人，而神、文音近，遂妄改之。今本《吟窗杂录》已经过南宋绍熙五年（一一九四年）陈永康的重编，易“神”为“文”，很可能就出于陈氏之手。《宋诗纪事》卷九十一谓文或“号文宝

大师，有《诗格》”，并自《历代吟谱》中辑其诗二句，显然是依今本《吟窗杂录》而言，不足为据。

神彧，生平无可考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其书于李洞《贾岛诗句图》之后，而《诗格》引诗也多为晚唐之作，又引贾岛诗而称“古人”，可推知其人当在五代宋初之时。除《诗格》以外，还撰有《四六格》一卷，《通志·艺文略》八著录为僧神郁撰。案《说文》，“彧”意为“有文章也”。段玉裁注云，“今本《论语》‘郁郁乎文哉’，古本多作‘彧彧’”（《说文解字注》第七篇上）。可见“彧”“郁”相通，神郁即神彧。

此书共八节，论破题、颌联、诗腹、诗尾、诗病、诗有所得字、诗势、诗道。其“论诗势”一节，杂取皎然《诗式》及齐己《风骚旨格》而略有损益。“论颌联”节谓“意有四到：一曰句到意不到；二曰意到句不到；三曰意句俱到；四曰意句俱不到”云云，乃出于禅宗“句”“意”之说。即“句到意不到：‘古涧寒泉涌，春松带露寒。’意到句不到：‘石长无根草，山藏不动云。’意句俱到：‘天共白云晚，水和明月流。’意句俱不到：‘青天无片云，绿水风波起。’”（《入天眼目》卷六）全书主旨在讨论作诗方法与禁忌等。

十三、《诗评》 桂林僧景淳撰

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二著录此书，云“桂林僧□淳撰”，“僧”下注“原阙”二字。卢文弨校云：“《通考》至大年本是‘德淳’”，未必可据。考书中征引诗例，有“河分岗势断，春入烧痕青”一联，乃宋初九僧之一惠崇《书杨云卿别业》句，录在其《自撰句图》之首。惠崇约卒于宋真宗景德四年（一〇〇七年），则《诗评》必成于此后。惠洪《冷斋夜话》卷六“僧景淳诗多深意”条云：“桂林僧景淳，工为五言诗，规模清寒，其渊源出于岛、可，时有佳句。元丰之初，南国山林人多传诵。”其

诗既传诵于元丰之初，则其人当在此之前，从时代来看，正稍后于惠崇。又《冷斋夜话》同卷“象外句”条云：“唐僧多佳句，其琢句法比物以意，而不指言某物，谓之象外句。如无可上人诗曰：‘听雨寒更尽，开门落叶深。’是以落叶比雨声也。又曰：

‘微阳下乔木，远烧入秋山，’是以微阳比远烧也。”即出于本书“象外句格”，而且引诗文字也完全一样（《全唐诗》即有异文）。可知惠洪不仅亲见其书，而且还有所袭用。故其后提到的“桂林僧景淳”，很可能就是指撰《诗评》的桂林僧□淳大师。

《冷斋夜话》“有剽窃之弊”（郭绍虞《宋诗话考》上卷，页十五）。故虽提到景淳，并袭用其文，却有意无意地回避其有《诗评》一书，可能亦与此有关。从《诗评》多引贾岛等人的作品来看，这与景淳的五言诗“渊源出于岛、可”也正相印证。其言桂林僧，可能是因为当时法名景淳者不一，如纂集《海会语录》的法演禅师的弟子亦名景淳，故以示区别。综上所述，撰《诗评》者，当为活动于北宋仁宗至神宗朝的桂林僧景淳。

《诗评》在理论上颇受皎然《诗式》的影响，如云：“远不言远，意中含其远；静不言静，意中含其静”，显然出于皎然所谓的“意中之远”、“意中之静”。又论诗的体势，也有取于皎然的“明势”。其言诗歌的“言”、“意”关系当“如铅中金，石中玉，水中盐，色中胶，皆不可见，意在其中”，这在严羽的《沧浪诗话》中得到进一步发挥。

十四、《续金针诗格》 旧题梅尧臣撰

此书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二十、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二十二录作一卷。晁公武提要云：“皇朝梅尧臣圣俞撰。圣俞游庐山，宿西林，与僧希白谈诗，因广乐天所述云。”希白即撰《处囊诀》的作者僧保暹之字。这段话正见于今本《续金针诗格》的序言中。陈振孙则认为题梅尧臣续撰，正如题白居易撰《金针诗格》

一样，“大抵皆假托”。但旧题蔡传编《吟窗杂录》已收此书，则假托的年代不会晚于北宋中叶。梅尧臣卒于宋仁宗嘉祐五年（1060年）则此书当出于其身后不久。《通志·艺文略》八著录此书作三卷，未录《金针诗格》，可能已是将两本合刻（《郡斋读书志》、《宋史·艺文志》录《金针诗格》并作三卷）。所以张鎰《仕学规范》卷三十七引及《续金针诗格》数则，其实大多出于《金针诗格》。张氏生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年），可见在南宋初年已有将两书合而为一者。至明代黄省曾《名家诗法》、朱紱《名家诗法汇编》及胡文焕《诗法统宗》，所收《金针诗格》均包括《续金针诗格》的内容。清人顾龙振编《诗学指南》，卷四所收《金针诗格》，署为“白乐天撰，梅圣俞续”。但混而为一，很难区别。

此书的内容正如其序中所称——“续之以广乐天之用意”，是在《金针诗格》的基础上作例证说明。如第一则“诗有内外意”，《金针诗格》只具纲目，而未举例，《续金针诗格》乃以杜甫一联诗为例说明“内外意”。所以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及《诗林广记》均引作“梅尧臣云”。此外，从《吟窗杂录》本所收的《金针诗格》和《续金针诗格》的比较来看，也能看出两书的关系为后者对前者的补充。

十五、《诗评》 佚名撰

此书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二十二著录，云作者“不知名氏”，当据北宋旧题蔡传编《吟窗杂录》本。此书列于《续金针诗格》后，未署姓名。后人未见署名，误以为作者同前，遂题作梅尧臣撰。今本《吟窗杂录》卷前总目“《诗评》”下即题“梅尧臣撰”，《诗学指南》本承之，亦题作梅尧臣。于此推知，此书作者移至梅尧臣的名下，可能是到南宋绍熙五年重编本所改。

此书作者既已佚名，时代亦不可考。浩然子《吟窗杂录序》谓

其所收诸者乃自“魏文帝以来，至于渡江以前”，而《诗评》列于《续金针诗格》之后，其产生年代可能也在此之后。从内容来看，作者颇为浅陋。如引贾岛《送杜秀才东游》，乃题作《送杜甫》，不知杜甫死后近十年贾岛才出世；又引杜荀鹤诗而题作杜寂，不知杜寂乃大历时人，而杜荀鹤为晚唐诗人。至于理论上，也只是据拾齐己《风骚旨格》以来的余绪，无多发明。

一九九三年三月于粒粟斋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京大学中文系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

《大清一统史略》题识

《清大一统史略》十一卷 日人佐藤楚材编 清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）世界译书局石印本 首册衬页有墨笔题识五行，文录下：

吾国国史，国内未之见及。东夷作此，以补其缺。然而，彼邦之注意我国，于斯可见，文化侵略由来渐矣，望国人见是书而景悟焉。

铁民偶笔 丁巳七夕

按：是书封面及书内有吴复曾的印章和签名，铁民盖其号也。清朝国史初成于乾隆八年，至乾隆二十八年特诏重修，是为《大清一统志》五百卷，《四库总目》卷六八著录。铁民未见此书，故发感慨如是。此本今藏安徽大学图书馆。

• 李国庆 •